

追忆“鱼爷爷”金万昆 年年有鱼

文 王学志



左图：创业初期的金万昆
(右)在鱼塘 图片由王学志提供
右图：金万昆

在天津宁河芦台的鱼塘边，金万昆坚守了一辈子。他发表了96篇学术论文，出版了5部学术专著，为淡水鱼类遗传育种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基础性资料。他培育出11个国审水产新品种，大幅度提升了养殖户的收入，堪称水产育种专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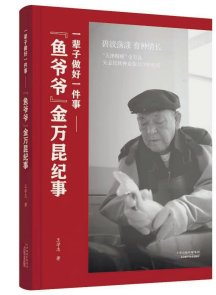
2023年12月2日，金万昆因病辞世，享年91岁。接到为这位老人著书立传的任务后，我一直在思考，该从哪里起笔书写呢？在天津市总工会领导的介绍下，2024年早春二月，我驱车往返百余公里，在宁河区总工会相关领导的陪同下，走进金万昆创办的天津市换新水产良种场，进行了首次采访。

金爷爷的办公室依然保持原状——那把椅子肯定是老物件：碎裂的人造革表面和反复缠绕的胶带，足以见证其年代久远；一台大电视机，是早已淘汰的老款式；办公桌不大，左侧放着厚厚的一摞书籍和资料，上面是金爷爷用红、蓝、黑三色铅笔勾勾画画的批改和注释，就像他昨天刚刚看过一样；桌上还摆着一个小小的葫芦，上面烙着“鱼趣”两个字。

大家伙儿更喜欢称金万昆为“鱼爷爷”或“他老”，前者显得敬爱，后者透着亲切。鱼爷爷曾说：“我就是‘鱼花子’（打鱼的）出身，党培养了我，我的一切成绩归功于党，归功于人民。这辈子我就为做好一件事——培育出好鱼苗！”直到去世前，他仍心心念着自己钟情一生的宝贝鱼儿们。

通过长时间的实地采访、调研，搜集信息，我感动于他从一块荒地起步，挖鱼塘、建渔场、修道路、建车间，像铁人一样，忙了一年又一年，一直干到生命的尽头。也在思考着，在这一个个璀璨的人生闪光点背后，指引金万昆不断找寻方向、不断成长、坚定前行的灯塔是什么。

写《一辈子做好一件事——“鱼爷爷”金万昆纪事》这本书，让我记住了金万昆常说的一句话：“袁隆平搞杂交水稻，还是那块水田，收的粮食更多更好，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。鱼类育种也是如此，不管是种庄稼还是养鱼，没有良种，绝对不行。”袁隆平爷爷的“禾下乘凉梦”已成现实，而“鱼爷爷”金万昆的“年年有鱼梦”，我想也终将梦想成真。



《一辈子做好一件事——“鱼爷爷”金万昆纪事》封面

以土办法采卵孵鱼苗 建设北方家鱼繁育场

1932年，金万昆出生在芦台一个渔民家庭。一家老小挤在破旧的渔船上，过着风雨飘摇、居无定所的生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芦台成立渔业生产互助组，渔民们推选金万昆当组长。1956年，芦台换新渔业生产合作社成立，金万昆担任了社长。身为带头人，他常琢磨：社员们每天起早贪黑捕鱼捞虾，年复一年，渔业资源终将匮乏，怎么办？那就得“两条腿走路”，发展渔业养殖。

长期在水上谋生，金万昆掌握了各种鱼的生活习性。他在船头往四周一看，就能通过水面、水流、水情判断出这段河道上哪个地方有鱼。到什么季节，什么样的鱼追逐产卵，细心的他也一清二楚。

他头戴一顶麦秆编的大草帽，光着膀子，赤脚走在河滩上。走上一段路便停下脚步，蹲下身往河里瞧。稻草一捆一捆绑好，在河里做了记号。一次次蹬水下河，直到把稻草捆全部放稳当。

深夜，河水哗哗地响，像开了锅似的。金万昆心里甭提多高兴了，他知道，这些响动是一群一群的鲤鱼在咬杆。约莫一个小时过后，喧嚣的河面恢复了平静。

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金万昆蹚着水，向稻草捆走过去。定睛看，稻草捆上粘满晶莹剔透的小珠，他知道，这就是鲤鱼的受精卵。把粘满鱼卵的稻草捆运回合作社，从各家拿来坛坛罐罐、缸缸盆盆，全都盛满水，把稻草放在水里。屋里，院里全摆满了，合作社看上去好像卖瓦盆瓦罐的门市部。

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金万昆拿了个小板凳，坐在坛坛罐罐旁边，像小学生一样认真，观察鱼卵的变化，记在小本子上。过了四天左右，他欣喜地发现，坛坛罐罐、缸缸盆盆里出现了很多“水花”，鱼苗顺利进入第一阶段，意味着采卵孵化成功了！消息传出去，轰动芦台，领导决定：将八个废弃的窑坑拨给换新渔业生产合作社，挂牌成立“换新渔场”，由金万昆兼任场长。

金万昆没有豪言壮语，他激励大伙儿的方法很简单，那就是自己带头，吃大苦、受大累、流大汗。几十名男女老少开始了创业征程。第二年春天，三十多个方方正正的鱼池像棋盘一样横卧在大地上，水放得满满的，平静的水面倒映着朵朵白云，仿佛群鱼在池中游动。

一批一批的鱼卵，被取回来放在鱼池里。几天后，鱼卵破膜变成细小的水花；十几天后，长成“乌仔头”，群群小鱼在鱼池中不停地游。到了秋天，鱼池中的鲤鱼个个都有半斤重！

1958年，上级奖给换新渔场3000尾花鲢和白鲢鱼苗。这批鱼苗来自长江之滨的江西省瑞昌县（今瑞昌市），那是青、草、鲢、鳙“四大家鱼”的摇篮，鱼苗质优、高产，享誉长江流域，素有“金不换”之称。领导下达指令：要求金万昆养好这些鱼苗，并推

广到北方各地。

鱼苗很快运到换新渔场，安置在鱼池里。金万昆昼夜观察，结合以往经验，设定喂食时间，一点点摸索。转年秋天，绝大多数鱼都长到了一公斤左右。养殖鲢鱼成功的消息轰动了华北渔业界，大家纷纷到宁河芦台参观取经。

1961年初春，金万昆前往江苏学习白鲢孵化技术。他的文化基础薄弱，科学知识欠缺很多，慢慢地自己琢磨出学习方法——课堂上没听懂的词，先记下读音，下课后查字典，誊写在本子上，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。他曾回忆：“这40天主要是学催产孵化，特别是学淡水鱼的生物特性。我觉得我下了最大的力气。反正领导说的话咱不能忘——要把南方的花骨朵给北方掐回来，在北方结果儿！”

就是靠着铁件磨钻的精神和钻劲儿，1961年，换新渔场通过人工孵化成活了100多万尾白鲢鱼苗。从这时起，在中国北方，有了第一个家鱼繁育场。与此同时，金万昆抓紧自学，《淡水养鱼》《鱼病防治》等书籍，那都是两寸多厚的大部头，他借助字典啃了一遍又一遍，记下16万字的自学笔记，专业知识突飞猛进。

年孵化鱼苗4亿尾 四大名鲫落户天津

1987年春天，万物复苏，垂杨柳吐绿飘絮，换新渔场已经更名为“换新水产良种场”，几十个大鱼池清波荡漾，浮光耀金，一派生机。金万昆带领全场17名职工，向着既定的生产目标——孵化鱼苗4亿尾进军。

金万昆不止一次说过，鱼苗孵化就是打仗，渔场就是战场。这次孵化4亿尾鱼苗更是一场硬仗。这一年他55岁，就像一个老将军一样坐镇中枢，指挥全局。终于，时机到了。4月

15日，天气预报说后半月以晴为主、平均气温20℃。金万昆拍手称快：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都齐了，20日开始孵化！”

4月20日当天，金万昆起得特别早。匆匆吃过早饭，走出宿舍，良种场的17个人一个不少，各就各位。孵化池旁摆了一张长条桌，配好的催产药剂，整整齐齐放在桌上，上面盖着经高温消毒的白毛巾。金万昆穿上水裤，手拿注射器，给从鱼池里捞上来的亲鱼注射催产药，认真细致，一丝不苟。之后他脱去水裤，蹲在产卵池旁，观察亲鱼的动静。

金万昆曾这样回忆：“孵化开始后每天连轴转，最多睡三个小时，还不是一次睡三个小时，得随时随到，两三个月人离不开池子。”

白天，他吃完饭把嘴一抹，连宿舍都不回，直奔孵化池；晚上，繁星满天，他坐在环道旁观察受精卵破膜成鱼的过程，实在困得不行，就披件衣服打个盹儿。就这样，整整两个半月，鱼苗孵化工作终于顺利进入尾声。

鱼苗孵化后期，金万昆肺炎复发，他咬牙顶着，不肯去医院。等孵化季结束，喜讯传来：鱼苗孵化数量达4亿尾，而且还在4亿尾这一大关上多添了点儿零头。负责统计的会计小杨兴冲冲地将这个消息告诉金万昆。“您这回该住院了吧？”小杨关切地问。金万昆这才答应：“行，明天我收拾收拾，到医院检查，有问题就住两天，没问题的就回来。”

“育出一条鱼，让养鱼人好养，吃鱼人爱吃，卖鱼人好卖，这是一个产业链，使更多人勤劳致富，改变生活。”这是金万昆的座右铭，是他一生的奋斗目标。他深知，要想走在水产养殖领域前沿，同时满足老百姓的营养膳食需求，必须不断地培育出新品种。于是，1994年，金万昆把目光投向鲫鱼养殖。道理很简单——老百姓爱吃啥鱼，养鱼户养啥鱼赚钱，就研究啥鱼。

这一年金万昆已经62岁了，他通过黑龙江省水产科学研究所科研人员撰

写的《黑龙江省方正县双凤水库的鲫鱼》一文，了解到当地的鲫鱼在比例性状、生长速度等方面都较其他鲫鱼优良。于是，他组建“四大名鲫引进小组”，经商议，引进路线为：先北上黑龙江，再挺进中原转战河南的淇河鲫产地，然后马不停蹄直奔云南滇池，最后直插江西彭泽，年底之前一定要完成四大名鲫的引进任务！

金万昆与小组成员到达双凤水库。多半天的工夫，选出2000尾三倍体方正银鲫。看着欢蹦乱跳的鱼儿，金万昆打心底里高兴。不敢耽误，连夜将银鲫打包装箱，运到火车站，押车回芦台。

下一步，该去河南接淇河鲫了。金万昆带着两名小组成员——场长助理李聪、水产高级工程师宋文平登上开往中原的火车，在汤阴站下车，转乘公共汽车前往鹤壁市。淇河，发源于山西棋子山，淇河鲫只在鹤壁、许家沟一带流域生存繁衍。金万昆等人在淇河水产良种场买了1167尾纯种淇河鲫，租汽车运输，李聪押车回场。

随后，金万昆、宋文平从郑州奔昆明，到滇池，将1000多尾滇池鲫运回芦台。两人一鼓作气，又从昆明赶往江西南昌，转彭泽，顺利引进了彭泽鲫。就这样，在宁河的换新水产良种场，四大名鲫安家落户。

他能听懂鱼儿“说话” 17年培育出“超级鲫”

鱼儿每个细微的动作，对于金万昆来说都是一种无声的语言。你看，鱼儿集群活动，争相抢食，互相追逐，这是健康的表现；离群缓游，体色发黑，这是寄生虫病的特征，多半得了肠炎或烂鳃病，需要投药；如果传染了锚头蚤病，鳍部往往最先出现红肿，鱼以为有什么东西附在身上，会惊慌不定，烦躁不安，拼命疾游，企图甩掉，这时该用漂白粉、敌百虫了；黎明前后，鱼跑到水面上吹气

讲述

非虚构作品《绿色的火焰》再现历史切片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天津人

口述 张庆国 整理 何玉新

近日，“碧草丹心，星月长明——《绿色的火焰》新书发布会”在北京、昆明两地举办。该书作者张庆国、《文艺报》原总编辑梁鸿鹰、《小说选刊》副主编顾建平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围绕这部作品展开探讨。

《绿色的火焰》是一部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化抗战全貌的非虚构作品。作者通过实地寻访，依次勾勒出張元济、梁思成、钱穆、费孝通、穆旦、艾青、梅贻琦、竺可桢、王芸生、洗星海、熊佛西、欧阳予倩等文化界名人在当年的状态，展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伟力与文化担当。

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 为西南联大殚精竭虑

2023年冬天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先生给我打电话，约我从抗战大后方文化活动这个角度写一本书，讲述国破家亡时中国人守护文明的故事。他的信任给了我巨大的鼓舞，也让我找到了思路——山河破碎，炮火连天，但人类的文化活

动仍然存在，有人在战壕里写作，有人在炸塌的剧场里唱歌。

2024年，我只身从北京西站出发，像一个抗战时的流亡文人，进行了长达一百多天的田野调查，到达所有将会写到的事件现场。这个过程中，我随时停下来，用手机拍照，记录下所见、所闻、所感。晚上回到酒店房间，打开电脑写日记，最终整理出50万字的采访文字。

2024年初秋，我从北京开车前往天津。陈卫民教授在南开大学门口等我。我们先去拜谒了南开创办人严修、梅贻琦的雕像，离此不远，同样的绿树丛中，立着张伯苓的半身石雕。他们都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。陈教授带我参观南开百年校史展览，我在展览图片上找到了梅贻琦身着长衫、腰背挺直的身影，还看到了他一家几口合影的温馨画面。

梅贻琦出生在天津，是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，严修是他的恩师，张伯苓是他的导师。他从南开升入保定高等学堂，1909年，以第六名成绩考取庚子赔款首批留学生，到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专业。学成归国后，进入清华学校教物理，又担任校务，处理琐细杂事。

1931年，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。危难之际，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。1937年，南迁前夕，他成立迁移工作小组，统筹制订计划，协调交通工具，安排路线，与铁路部门沟通争取到一定数量的火车车厢，保证了师生安全及书籍、仪器的运输。

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初建时，梅贻琦请建筑专家梁思成、林徽因设计校舍，所有房屋全是平房，图书馆、食堂是瓦顶，教室是铁皮顶，办公室和宿舍是茅草顶。1939年4月，联大新校舍全部落成，分东区、西区、东北院、中心区、南区和学生宿舍区。

梅贻琦是高校管理专家，遇到他，是西南联大的幸运，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幸运。他处变不惊，泰山崩于前，渺小的人类难以逃脱，慌张和叫屈都毫无用处，只有从容面对，镇定观察，才能求生和吐大。

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人 雕像矗立于南开校园

记得我来到南开大学，在陈卫民教授的带领下，找到校园中的穆旦雕像。他微低着头，目光从眼镜片后面投射过来。一面矮墙镶了石板，刻有

“穆旦花园”四个字。

穆旦生于天津，本名查良铮，祖籍浙江海宁。金庸（查良鏞）是穆旦的同族叔伯兄弟。穆旦的父亲读过大学，母亲从江南余姚嫁来，不识字却好学，每天缠着丈夫教她几个字，慢慢读完了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。

穆旦在南开中学上学，后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，又转到外文系。二年级时，七七事变发生，家国面临毁灭，让人痛心疾首，穆旦也在诗歌《赞美》中展现了对大好河山的眷恋。

清华、北大和南开迁往长沙，组成临时大学。1938年1月，期末考试后，师生们分三路去往大后方昆明。穆旦报名参加了步行团，戴军帽、穿军服、打绑腿，一路向南而行。他是充满激情的诗人，对陌生的世界有极大的好奇，想到要步行穿越三个省，还要穿越少数民族聚居区，见识到独特的生活场景，他很兴奋，忘记了辛苦。闻一多作为护送教师，也加入了步行队伍。穆旦特别高兴，途中常找闻一多请教诗歌写作的技巧。

步行团安排了摄影、写作、调查等活动，穆旦构思自己的作品，并与同学热烈讨论，计划到昆明后立即成立一个诗社，共同创作和讨论诗歌，他也开始酝酿组诗《千里步行》。

来到昆明一年后，他亲眼看到学校房屋被炸塌，战争的残酷对他的心灵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撞击，他用叙事与抒情交互表达，完成了诗作《防空洞里的抒情诗》。人类可以失去居所，但不能失去诗歌，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战乱中写作，用诗谴责侵略者，描绘被炮火摧毁的家园，为苦难的人民发声。

1941年年底，日军偷袭珍珠港，并把战火烧到东南亚，计划从缅甸入侵云南，直逼重庆。中国成立远征军人缅参战。此时，穆旦已毕业留校任教，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，加入远征军，做了英文翻译。抗战胜利后，穆旦去美国留学，1953年归来，此后一直在南开大学当教师。



作家张庆国

从学徒成长为时评人 以笔为枪激励中国人

1901年，王芸生在天津出生，早年家贫，到一家茶叶铺当学徒。按常理讲，将来做顺手了能升掌柜，独当一面，若有幸自立门户，更是登上了人生顶峰。但他志不在此，每天干完活，就找掌柜的借书翻阅，出门办事路过街边报栏，也看得痴迷。他有一肚子话，想一吐为快，试着写稿投给报社，竟被刊出。他大喜过望，越写越多，越写越好。

1925年，五卅运动爆发，王芸生参与了声援上海工人的行动，被推选负责宣传，主编《工会周刊》。1926年3月，《工会周刊》被迫停刊，他远走上海，很快成长为笔锋犀利的时评人。返回天津后，于1929年加入《大公报》。

泡玩，不要以为这是它们顽皮，这是水里缺氧的表现，需要添水、换水；有时鱼儿表现得特别馋，半天的饵料两小时就抢吃一空，有时却又耍小脾气，全体罢吃，这是变天的先兆，不是狂风将袭就是暴雨将至，需要提前做好准备。

金万昆是怎样弄懂这些“语言”的呢？无他，但手熟尔。他白天趴在池边观察鱼，一待就是大半天；夜间到池边去，脚步轻得连鱼儿也觉不出一丝动静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观察再观察、琢磨又琢磨，鱼儿成了他最好的伙伴。

选育一条鱼，要考虑其体型、生长速度、抗病性、口感、营养、饲料系数、养殖效益等因素，要坚持在大群体中选育，坚持优中选优，这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，最累人的，莫过于选育期间的每一条鱼都要精心照料，做好详细的数据统计与观察记录。

1988年，金万昆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引进建鲤鱼苗175万尾，精心饲养，进行一代代选优。在此基础上，他带领育种团队以提高鱼种抗寒能力、生长速度、繁殖力等为目标，开始培育适合在北方推广的鲤鱼新品种。经过连续17年的六代选育，在建鲤的基础上育成了“津新鲤”。2006年，津新鲤通过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，成为在全国推广的新品种。

2002年，在津新鲤的选育期间，恰巧，金万昆从天津市水产技术推广站黄港良种试验基地引进了5龄乌克兰鱈鲤241尾，经过培育、扩繁和考种后，发现这种鱼比当时正在养殖的津新鲤长得更快。

鲤鱼，在天津又被称为“拐子”，习惯紧靠河底游动觅食，碰到渔网、木桩、石头等物就会蹦起来。雄鱼长到0.7公斤至0.9公斤时蹦得最欢，天津人称这时候的鲤鱼为“顺拐”。相比之下，乌克兰鱈鲤的鱼身较扁平，不符合天津老百姓的饮食习惯。

市场的需求，正是培育新鱼的着眼点。金万昆琢磨，乌克兰鱈鲤与津新鲤两者一结合，一条生长速度更快、外部特征更好，抗寒力更强的新鱼不就诞生了吗？当然，这只是理论，接下来，他们又用了12年去实践，选出最为优势的组合，取名“津新鲤2号”，经济性状和养殖效益显著提高。在辽阔的东北平原、内蒙古等地，津新鲤2号成鱼能在零下30℃的环境中存活，业内人士给它起了个响当当的绰号——超级鲤！

培育过程中，金万昆在选种、喂食、水质等方面都下了不少功夫。比如，为了能掌握鱼儿每天的进食情况，他设计了专门用来让鱼吃食的食台——在鱼池里固定四根木桩，把纱网的四角分别钉在木桩上，一座食台就做好了。鱼儿撒进池塘，先落在纱网上，一方面节约了食食，另一方面有助于研究人员掌握鱼的进食习惯和进食量。

从优异的性状到优质的新品种，选育过程艰辛又漫长。现如今，112个品种、25万余尾活体鱼，被养殖在换新水产良种场的池塘里。这是金万昆一手建立起来的淡水鱼种质资源活体保存库，也是新一代“换新人”的底气所在。金万昆用一生的时间，留下了11个国审水产新品种和10项专利证书。这“做鱼”的本领，也已从老场长那里，完完整整地传承到了新一代人的手中。

1936年，日军从关外向内扩张，进逼华北。为防不测，《大公报》决定在上海办分馆，由王芸生负责编辑。七七事变后不久天津沦陷，天津《大公报》停刊，上海版《大公报》担起了发声重任，王芸生写社评、看大样、等候前方记者来稿，夜以继日。由于经费不足，他倡议撰稿人降稿酬，自己带头不领稿费，只为保证报纸渡过难关。

日军占领上海后，为控制舆情，下令所有报刊须送小样到日军指定部门检查。王芸生负责的上海版《大公报》自动停刊，以示抗议。他亲笔撰写社评，坦陈报人的爱国之心，向热情支持和关心《大公报》的上海读者告别。

随后，王芸生颠沛流离，先是迁到武汉，又从武汉迁往重庆，出任重庆版《大公报》总编辑。1939年5月，日机轮番轰炸重庆，《大公报》报馆被炸成废墟，一名工友遇难。王芸生的家被炸塌了一半，幸运的是，他和长子、长女均不在家，夫人抱着次子、幼子借助楼梯躲过一劫，次女蹲在写字台下面，捡了一条命。

《大公报》继续出报。房子塌了，他们就借用《国民公报》的房子临时办公，王芸生用血与火的文字，抨击侵略者的罪恶，为民众和士兵打气，鼓励大家看到侵略者必败的远景。这是报人在用笔参加抗战，他认为，命运握在每个人中国自己的手里，中国人自己不沉沦，就不会亡国，所有中国人都把国家命运牵挂心中，国家就会振奋强大，不再受欺辱。

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，他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。文化是一种态度，表明人类在认真生活、反省存在的意义；文化还是人类的灯塔，引领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。我希望能把这种精神的力量传递下去，对我来说，是一件光荣的事。